

四川大学中文系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

主办

现代中国 文化与文学

XIANDAI ZHONGGUO WENHUA YU WENXUE

第2辑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四川大学中文系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

第2辑 || 现代中国
文化与文学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第2辑/毛迅,李怡主编. —成都:巴蜀书社,2005. 12

ISBN 7-80659-807-3

I. 现... II. ①毛... ②李... III. ①文化—中国—现代—文集②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G12-53②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6201 号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二) 毛迅 李怡 主编

责任编辑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028)84122206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30mm × 170mm
印 张	17.75
字 数	400 千
书 号	ISBN 7-80659-807-3/I·253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卷首语

- 是断裂还是生长：再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断裂说”
——中国现代文学价值三人谈 毛迅 李怡 李自芬 1

文学感受与中国现代文学

失落了文学感受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

——主持人语 李 怡 15

在学术论文的大生产运动中想起李健吾 刘 纳 17

文学感受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秦 弓 21

文学研究：从“惑”开始

——以我自己的研究经历为例 李 今 24

西方现代学术研究中文学感受研究略论 刘俐俐 田淑晶 27

文学感悟在西方学术中的地位 阎 嘉 33

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人文精神：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主持人语 毛 迅 36

略谈当前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人文精神 陈祖君 38

苦难意识与知识分子的道德实践 王劲松 42

梦醒了的“知识分子”何去何从？

——从张炜《精神的背景》的讨论谈起 张志云 46

市场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精神 朱美禄 50

承传与变奏

——知识分子传统及其现代转型刍议 颜同林 54

全球化与启蒙：不可通约的理论命题？ 王 平 58

巴蜀文学重读

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学中心地位 冯宪光 63

北京、上海文学中心的陷落与重庆文学中心的形成

——略论抗战对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影响 张武军 73

四川“荒地”与《饥饿的郭素娥》 倪海燕 79

论郭沫若与中国书法文化 李继凯 83

文学史新论

《青春万岁》的精神现象学

——《王蒙传》之第三章 於可训 96

大陆女性小说在台湾的出版与研究(1979—2004) (台湾) 宋如珊 107

火与水:中国新文学中的两种生存情绪 段从学 115

延安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深化的可能 周维东 128

社交舞与“海派”小说 马云 137

沈从文创作的边缘价值 邢建勇 145

阿索林和京派作家的文化情怀 马俊江 150

《丛刊》:百期成长与学科的新趋向 杨天舒 熊 权 155

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

文学审查与中国现代文学 王本朝 166

文学史视野中的传媒和传媒视野中的文学史 曹立新 173

文化全球化的历史根源之初探 李 理 178

商衍鎏与德国汉学 柏 桦 184

欧洲汉学学会主席瓦格纳教授访谈录 何 休 190

现代中国文学档案

中国新诗档案:1950 刘福春 199

当代“潜在写作”史料:关于哑默《真与美》的史料(二) 哑 默 231

文学应如何寻求“大声音” 阿 来 陈祖君 260

读者告白

《柔石评传》:新的突破 王吉鹏 赵 鹏 274

稿约与稿例 本刊编辑部 279

Contents

Preface

Breaking off or Growing up?

——Tribune on the Value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 Mao Xun Li Yi Li Zifen (1)

Literary Intellect and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The Host's words: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Lost the Literary Intellect

..... Li Yi (15)

The Recall of Li Jianwu in the Mass Production of the Research Paper

..... Liu Na (17)

Literary Intellect and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Research Qin Gong (21)

Literary Research : Starting From the Puzzle Li Jin (24)

A Brief Analysis of Literary Intellect in Western Modern Academic Research

..... Liu Lili Tian Shujing (27)

The Status of Literature Comprehension in the Western Academia Yan Jia (33)

The Spirit of Humanism and Chinese Modern &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 Host's words: The Spirit of Humanism: Where is the Problem?

..... Mao Xun (36)

A Brief Talk on the Spirit of Humanism in the Present Chinese Literary Creation

and Research Chen Zujun (38)

Consciousness of Misery and Moral Practice by Intellectuals Wang Jinsong (42)

The Choice of the Future Road for the Wakened Intellectuals ... Zhang Zhiyun (46)

The Mental Condi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Market Background

..... Zhu Meilu (50)

The Passing on of Tradition and Its Variation Yan Tonglin (54)

Globa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 Unlinkable Theoretical Problem?

..... Wang Ping (58)

The Rereading of Sichuan Literature

Chongqing's Leading Status in Literatur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Feng Xianguang (63)

The Subsidence of the Literary Center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enter in Chongqing Zhang Wujun (73)

- Sichuan Waste Land and *Hungry Guo Sue* Ni Haiyan (79)
 Guo Moruo and Chinese Calligraphy Li Jikai (83)

Up - to - date View on Literary History

- The Mental Phenomenology in *Youth Long Live* Yu Kexun (96)
 The Publication and Research in Taiwan About the Feminine Novel in the Mainland
 1 (Taiwan) Song Rushan (107)
 Fire and Water: Two Survival Emotions in Chinese New Literature
 Duan Congxue (115)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Deepening About Yan'an literary
 Research Zhou Weidong (128)
 Social Dancing and the Novels in Hai Group Ma Yun (137)
 The Borderline Value of Shen Congwen's Novels Xing Jianyong (145)
 Ahasolin and the Cultural Affection of the Writers in Jing Group
 Ma Junjiang (150)
 Collection: Growth of a Hundred Issues and the New Trend in the Subject
 Yang Tianshu Xiong Quan (155)

Modern Literature and Modern Culture

- Literary Examination and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Wang Benzhaoh (166)
 Mass Medium in the Vision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Vision
 1 of Mass Medium Cao Lixin (173)
 Exploration of the Root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Li Li (178)
 Shangyanliu and German Sinology Bo Hua (184)
 The Record of the Interview to Professor Valgena, Chairman of European Sinology
 Committee He Xiu (190)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iles

- The Record of Actual Events About Chinese New Poetry: 1950
 Liu Fuchun (199)
 Contemporary "Potential Writing": About Yamo's *Genuineness and Beauty*
 Ya Mo (231)
 How Does Literature Seek for "Loud Voice" Alai Chen Zujun (260)

Professions of Readers

- Roushi Critical Biography*: a New Breakthrough Wang Jipeng Zhaopeng (274)
 Notice to Contributors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279)

是断裂还是生长：再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断裂说”

——中国现代文学价值三人谈

□ 毛 迅 李 怡 李自芬

（编者按）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重估问题一直困扰着学界，其中，断定现代中国文学“断裂”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声音一直占有相当的分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此的回应虽然不断出现，但似乎都流于为“断裂”而掩饰，这样似乎还不足以直接面对“断裂”之说的挑战，究竟中国现代文学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存在这样的“断裂”，我们又当如何来评判这样的现象，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几位学者进行了这样一番对话。

李怡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许多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的思潮或者说声音，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对“五四”新文学开启的现代文学的性质、价值取向等的重新认识和估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估价中，有一种声音显得非常突出，这就是“五四”新文学出现了与传统文学的根本断裂。而且，在一些批评家那里，多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共同作为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发生空前断裂的标志。这在某种意义上构成90年代后现代文学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主流的声音。这种声音到目前，已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注意，并不止一次对其进行质疑，表明了不同的态度。但与断裂论声势如潮的景象相比，质疑和回应的声音还显得很微弱，力量不够。

毛迅 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它实际上对现代文学甚至新文化运动的合法性及存在根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至少让它变得晦暗不明。我们仅仅从一个学科的感情角度，从对现代文学学科的自我维护目的出发，即为了对现代文学学科本身负责，我们也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反思。这种武断和随意性，它可能从另外一个层面完全遮蔽了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一些真正的本质。新文化运动以来，它走了这么多年，现在要把这块彻底摧毁掉，那么，如何退回到新文化运动前，这种可能性存在吗？仅仅从时间的层面看，它根本就不可能退回去。而从内在逻辑的层面，“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根本就没有与传统发生过断裂。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深思熟虑的清理和认真的分析。因此，对断裂论回应的声音显得软弱，不足以与之抗衡。

李自芬 这种“回应的软弱”事实上导致了目前研究者对断裂论的不加分析

的滥用。这种滥用势必造成我们对自身赖以生存的文化世界认识上的混乱，而且对我们今天文化的健康发展造成某种干扰。事实上，这种干扰的结果已经显露出来，对新文化运动的完全否定，既让我们陷入一种对中国文化缺乏自信力的无名的焦虑，同时也让我们对90年代以来的文化发展缺少一种健康平和的应对心态。因此，这种回应在今天显得尤其重要。如果我们不对此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反思——不把上个世纪的文化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的话，在新的世纪，中国文化又面对选择新的发展方向时，这种混乱和矛盾的心态必将使我们走入另外的误区。

李怡 这里有一点必须要认识到，很明显，过去有一些长期从事现代文学的学者对断裂论还是有一种本能的反对。但是，他们回应的力量很弱小。原因在于，他们往往简单地用不断裂来对抗“断裂”。有人提出，我们的新文化和新文学与传统文化与文学断裂了，反对者就认为没有断裂。但他们在提出没有断裂的同时，却没有回答一个文学史和文化史的重要现象问题。的确，现代文学与传统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改变，而断裂论者恰恰抓住了这种改变了的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夸大了这种改变了的形态或现象，或者说混淆了它改变了的实质。而反断裂论者似乎又想极力抹杀这种改变。前者夸大了这个改变了的事实，而后者则是有意地回避了这个改变的事实。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更好地来描述这种改变的方式或概念。我们既要承认这种改变，同时又要证明这种改变是有意义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上的断裂。

毛迅 从这个意义上，重新提出这种反思，同时在阐述我们对这种现象的看法时，找到一种新的更有力的叙述方式，在今天显得尤为必要。

李自芬 的确，一直以来我们对断裂论及与断裂论类似并行的一系列阐释方式没有进行很深思熟虑的清理。比较典型的就是，由于断裂论强调西方影响，而仅仅从西方影响的角度并不能清晰地阐释新文化或是新文学的特质，于是有些人就用传统影响去反抗断裂论，试图从传统中找到影响新文学的因素以对抗断裂论。实际上二者都陷入了逻辑的矛盾，只看到单方面的影响，忽略了文化自身的特性。

毛迅 实际上，在影响的过程中，被影响的一方是否仅是一种简单的被动关系？自己是否有自身主动的被影响的机制？这种机制正是其在影响中发生作用，发生了其传统的逻辑作用，而这点刚好被忽略了。所以人们只看到了变化的结果，而引起变化的内在逻辑则被忽略了，因而将影响与被影响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了。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对其理论层面进行再认识。

李怡 对于“断裂论”，从学术史的角度去寻找其根源，我认为有几个因素值得注意。首先，近代以后，从中国文化自身的转型来说，它承受了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挤压，这种挤压不仅是历史事实上的，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我们的心理事实，从心理上承受了许多西方文化的挤压。在这种情形下，如何看待自身的力量，看待自身文化的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在承受了如此大的心理挤压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准确描述出外来的文化与我们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其次，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后，整个中国文化界有一种很自觉的对80

年代比较明显的西化的批判和检讨，这一学术思潮对于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主流话语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看到，90年代后如新儒学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海外汉学尤其是美国的汉学界，从他们的立场对中国新文化也提出了一个加强对传统文化接受的问题。

李自芬 大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热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反应。这种回向传统寻找文化滋养的潮流，客观上促使了那些把“文化大革命”——甚至“五四”作为传统对立面的观念的产生。他们认为，正是“五四”的彻底反传统，导致了与传统的断裂，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化走入“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事实。这种未加深思和分析的观点，与海外汉学及新儒学构成某种表面的回应，终于被强化为断裂论者的一个似乎是非常有力的论据。

毛迅 它实际上成了研究界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合法的主流话语，一种权威判断。一旦我们讲到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化，断裂论就成为一个对整个新文化进行彻底批判的理论起点、一种习惯姿态——“五四”新文化成为了与传统断裂的边际，也是一个标志。而这样一种断裂论，其表面形态上的合理性，或者说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其回应的软弱无力，使得它已经成了一个被固定下来的知识，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误导，而其背后的若干的理论问题，无论断裂论者还是反断裂论者皆没有对其进行清理和反思。

李怡 其可怕性就在于此。它已经成为了青年一代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学的知识构成。

毛迅 我们今天就是想再次对这个基本上要固定为知识的论点——其内在的缺陷甚至是逻辑上的错误进行清理和反思。其实，断裂论及后来衍生的失语症、单方影响说，其逻辑上存在许多问题。首先，传统实际上是连绵不断的，就像艾略特所说，它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就像河流的运行，它不可能被人为地彻底断裂，断裂了就是没有了。即使是修三峡大坝，也只是将其阻隔了一下，不可能将其彻底消失，它仍然是长江。传统这条大河，实际上不断有新的河流、新的支流的汇入，然后进入到一个新的广阔的世界性的海洋，它是不断汇入、融会和发展过程。

李怡 毛老师刚才的比喻非常形象。拿我们长江、黄河来说，从其发源地到汇入东海、渤海，这完全可以用来说明我们的传统。从发源地到入海口，构成了滔滔不绝的传统之河，中间经过许多不同地形，形成不同的状，但是，其源头和终点是不变的。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其他的河流、其他的水源汇入，像长江中途就汇入了雅砻江、岷江、嘉陵江等等，它们是构成长江的主体水流的有机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途这些水源的滋养，长江依然是长江，而有了这些水源的滋养，长江并没有变成黄河。因而，传统是一个延续不断的自然过程，不是简单地可以人为截断的。

李自芬 实际上，一旦形成一个传统，它就具有自身的惯性——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不管是筑坝、改道也好，它仍然向前发展。我们承认，新的因素（水源）加入以后，原初的源头是有变化，但这些加入的东西并不能改变它本身的性

质。就像长江吸纳了嘉陵江、黄河吸纳了渭河，它还是长江、黄河，而不会变成嘉陵江、渭河。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所有这些支流的加入，是河流本身的内在需要。如果一条河流没有新水源的加入，就有可能干涸。它如果要成长，就必须不断地主动去吸纳雨水、支流等新鲜血液。文化传统也是如此，它是时间不断绵延下的积淀。联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西方知识资源的吸纳，其开放性是文化自身的内在需求。

李怡 在历史上，黄河经历了多次改道，这是基本事实。但是无论黄河怎么改道，我们关于黄河的描述都是关于黄河的历史事实。同时，接着李自芬的思路，如果不汇入支流，黄河不改道，更不能叫河流。像河流一样的传统，从古至今，绵延不绝，到今天还在滔滔不绝流动这一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变化——一定的变化本身就是传统的自然的内在需求。

毛迅 也就是说，汇入、吸收，这样才能保证传统之河流得更远。从传统之河的界说，我们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传统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生长着的有机体，其生长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元素加入。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看，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它都有一个向外融会、生长的过程，如璀璨的古罗马文化就融会了古希腊文化，英格兰文化是融会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并融会凯尔特文化、古罗马和罗曼文化的结果。今天的美利坚文化则几乎是在英格兰文化的基础上融会所有世界优秀文化的结果。传统不是凝固不变的，总有新的元素加入并一直在有机地生长。就拿中华民族自身创造的灿烂文化来说，它的形成也不只是一个单调的最原初的所谓中原雅音这样一个单一的声部，而是由华夏文化、楚湘文化、河姆渡文化、巴蜀文化等等许多区域性文化元素的不断加入而构成的。再加上少数民族文化如西域、北狄、北域文化等等新的元素的汇入，才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成了一部丰富壮丽的交响乐。

李怡 的确，在文化发展的事实上，每当在自己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有机地融会了其他新的文化因素的时候，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显得非常的强势和有力。比如，唐代对各种新的文化因素包括当时的“西方”——西域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部分融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唐之势。这也就有力说明了，传统自身是如何通过对其他文化的融会来保存自己的生命，从而成长壮大。

李自芬 而这些外来的文化因素通过自身文化机体的吸收，逐渐融会成为了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如今天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因素——佛教，事实上，它并不是中国文化传统原生的，而是在东汉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但现在已经融会成中国人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模式。因此，传统的形成、生长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吸纳融会新文化因素的过程。如果我们要真正去寻找那个单一的作为固定形态的所谓最原初的中国文化，是找不到的。因为，按断裂论者的逻辑，则后来的中国文化都不能叫中国文化。

毛迅 一种民族文化形态要取得世界性的认同，就是要不断地在融会中生长。这是文化本身生长、发展的逻辑。它只要不凝固，不死亡，就会不断寻求生长的可能。那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以后，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仍然

是一种生长、发展、融会的关系，并不是对传统的断裂。事实上，回推到“五四”前的那些历史阶段对外来因素的吸纳，我们都认为其是中国文化，而“五四”以后，为什么一些新的文化因素融会进来之后，这段文化反而就不叫我们的传统文化，而叫断裂？

李怡 这显然是荒谬的。传统作为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它要沿着其内在动力或者是指向发展的话，这自然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同样看到断裂论的逻辑矛盾。这就是，传统一旦形成了传统的一种形态的话，它就形成了自身的内在结构。

李自芬 可以这样说，一种文化传统一旦生成，它就有了自身的生命轨迹，只要它不死亡，它就会按照自己的生长轨迹向前发展。

李怡 也就是说，它就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表现。

毛迅 或者说，借用一个结构主义的说法，它就有它这个传统的深度模式。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去探讨中国文化的深度模式是什么，我们相信中国文化有自己的深度模式，那么，在这种深度模式或是逻辑的限制下，不管是怎样的吸收都不会改变其生长方向——也就是它本质性的特点。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见出，断裂论以及由它带出的单面影响论等，其最大的一个逻辑问题是，它将传统和我们所说的现代作为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作了简单处理，才导致了这样的误判。传统也好，现代也好，实际上，传统不断的生长、发展就是要走到它的所谓的现代，而现代都是从传统走来。所以，艾略特在他的《四个四重奏》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诗句就是：“今天里面包含着昨天未来/未来又包含着今天。”不管是今天、昨天还是明天，它都是一个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经过。它只是处在当下的人以一种时间概念对不同时段文化特征的划分，但并不是说现代的部分与传统毫无关系。这两者可以分为不同时空的两元，但未必就是对立的。

李怡 在传统之河从源头滔滔不绝向前的流动中，任何人为的切断都是不可能的，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水在这里体现了其内在的韧性，也就是其内在不可阻挡的逻辑指向。任何一个历史形态的归纳——归纳成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某种意义上都带有某种策略性。我们不能因为作出了这样的归纳，就从根本上忽略掉他们内在的有机的连续性。我们说，“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现代。这个现代，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区别于传统。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正是这样一个区别于传统的所谓现代又继续构成了传统的一部分，以致于当我们今天说中国文化的传统时，这一传统其实就包含了现代文化。

李自芬 也就是说，现代文化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整个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一旦我们言说中国文化时，我们意旨的也就是包括了现代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化传统。而现代文化与传统的这一整体性，是任何人为力量都无法把它割裂开来的。

毛迅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面对的过往的几千年的传统，它实际上也经过了无数的现代。他们当时面对的更远以前的传统，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以前的传

统，就是“他们”的无数次的现代。如我们现在谈古文运动时，他们的现代，对我们则是古代。那么，我们今天的现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将变成过去，也就成了未来人们看待传统的一部分。任何现代——无数个现代包括我们今天这个现代构成了传统的整体，所以，我们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方式来理解我们今天的现代与几千年的传统的对立，这是非常粗俗的处理方式。

李自芬 毛老师的分析为我们指出了断裂论这种简单粗俗的处理方式的内在逻辑矛盾。的确如此，如果我们以此逻辑来检视中国文化的传统之河，则会得出非常荒谬的结论。我们知道，每一个现代都是对过去的反叛、变革，都有反叛的因素，这是因为它要生长。如果有新的东西生长出来就是断裂的话，那么，中国文化有史以来一直就在不断反叛，因为事实上它不断地生长出了许多新的东西，以断裂论者看来，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化传统已经断裂了若干次。这个判断显然是不成立的。

毛迅 实际上，在文化生长过程中，不管是过往的反叛也好，或者是对外的吸收、交融也好，都是文化自身的生长需求。其结果不可能将任何一种文化传统（形态）特别地截断、终止，也就是所谓的断裂。除非是彻底地毁掉它，如自然灾害毁掉恐龙，或像玛雅文化遭到那种灾难性毁灭，那么，其正常的发展本身就包含我们所说的反叛、吸收、融会等种种过程。

李怡 事实上，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具体实践来看，这种所谓的断裂论也是站不住脚的。比如，我们抽取现代文学创作中最西方化的创作现象如象征派、新月派，后来的新感觉派及九叶派等来考察，他们的创作被断裂论者认为是最西方化的，好像是与我们文学传统不一样的形态，但当我们很深入地进入他们的创作文本，做到真正的熟悉，我们会很容易地看到，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明显的传统的思维模式及文化逻辑。

李自芬 的确，当我们仔细检视李怡老师所提到的这些在现代文学史上所谓最西方化的创作流派时，会清楚地看到，在他们最西方化的面孔下，中国传统因素的自然流动实际上非常明显。戴望舒的《雨巷》被认为是学习西方象征派的一个最成功实验。叶圣陶称其“为中国新诗开了一个新纪元”。但在其浓郁的象征氛围中，我们却熟悉地感受到由意象、意境构成的中国传统诗歌的意蕴美。其意象的直接来源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李商隐的《代赠》“芭蕉不结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和李璟的《摊破浣溪沙》“青鸟不传云外意，丁香空结雨中愁”。其另外一首诗《印象》更是将抽象的寂寞情绪化为系列象征性意象：深谷铃声，烟雨，渔船，真珠，古井，残阳——这些意象共同构成一幅浓郁的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一下子将我们拉进“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氛围。其间的情绪、情感以及其内在的精神形式和思维方式完全就是中国传统式的。

毛迅 这些诗是非常中国化的。它们是有一些西方的诗法技巧的实践，但在根本上并没有与中国传统断裂，只是在外在表达形式上有些变化。像徐志摩这样的诗人，也是如此，他直接就这么说“我爱欧化、我爱欧洲”。而且他的很多诗歌可以说是去国、去传统的结果。但在他的经典作品如《再别康桥》中，意象的

锤炼、意境的营造，以及讲求节奏、讲求韵律，包括整个诗歌结构中顶针手法的运用，其在诗歌美学意义上，完全是与中国传统诗歌接轨的，甚至没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说，他用白话来写，只是用了一些西方的符号，而表达的是典型的中国人的离愁别绪。

李自芬 这就像李老师在一次讲座中分析郭沫若对泰戈尔诗歌的模仿，其中体现出来的两个诗人精神气质的差异也更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泰戈尔那种对生命和世界的体悟，那种扎根于印度民族的文化和心理无意识中的精神特质和思维结构，郭沫若是无法模仿的，他想像泰戈尔那样发问和书写，但表达出来的思想仍是完全中国式的。

李怡 刚才所谈到的象征派、新月派等，是现代诗歌史上比较自觉的向西方靠拢、自觉沟通中西两种文化的典型例子。我们还可以在现代文学史上那些有意识地尖锐提出反传统的诗人身上找到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及中国式情感。这也同样可以证明，传统文化、传统文学作为一种深度模式在现实存在，比较典型的就是40年代的穆旦。他的反传统恐怕在整个新诗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例证，他甚至公开说过旧诗读多了对创作新诗没有好处。王佐良对此还有一个判断，认为穆旦的成功就在于他对中国传统的无知。我们现在就是要透过这样一些表面化的判断，去探究它的实质。根据今天一些学者，如也是我们四川大学的博士后王毅的分析，认为穆旦的《诗八首》的思维模式与杜甫的《秋兴八首》之间具有非常的相似形。我很同意他的观点。通过这种相似形——这种远距离的沟通，表面上很难看出穆旦主动积极地向古典诗歌传统的接通，但是，通过细读来展开其诗歌过程，就会看到，像穆旦这样极端反传统的例子也无法真正摆脱传统对他的影响。从而，我们可以重新清理现代文学在开拓未来方向时与传统及外来文化所构成的多种复杂关系，不能简单地用断裂加以归纳和结论。

毛迅 事实上，西方象征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诗歌传统中的某些内在思维方式比较相似。正是这样一些思维形式，构成了新文学主动接受的基础。虽然我们不叫象征主义，但它仍有托物寓志、假象见义等与我们诗歌传统的某些相似、相通的思维方式。那么，这就使得西方象征主义很自然、很顺利地在我们这里生根，开花，壮大，同时也就说明，凡是在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中，能够强势生长的那些所谓外国诗学文化，包括象征派等，恰好就是契合了中国相应的文学与诗学传统中的思维方式与欣赏习惯，才生长得有声有色。

李自芬 正是这种契合，成为卞之琳等现代诗人自觉沟通中西的基础，并且决定了他们对西方诗歌知识资源的接受和吸收的取舍。比如他们对法国象征派的选择，选魏尔伦而故意忽略马拉美，就是其中国传统内在思维模式在起着制约作用。因为，魏尔伦强调的“亲切”（intimacy）与“暗示”（suggestion）刚好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讲求意象营造、语言含蓄契合在一起，切中了他们内在的精神需要和审美欣赏习惯。卞之琳就认为，“亲切与暗示正是旧诗词的长处”。而马拉美作为法国象征派的重要代表，因为他的肉欲、他的色情，在筛选时就被自动删除了。

李怡 这就证明，在实践的层面，是我们文化传统内在的东西在决定我们对外来东西的选择和吸收，这种选择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同时，也就更说明了，在现代文学中即使是那些最现代主义的层面的实践，其骨子里面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度模式的指引下来展开的。

毛迅 这种情况之外，还有更多的不断主动向传统回归的潮流。它们虽然是用白话写新诗，用白话写散文、小说，语言形态上好像与传统的语言形态不一样，但在很多方面，如审美观念、意象选取、情绪、音律上有主动回归的倾向。因此，语言形态、形式上的差别并不能断掉其内在的精神联系，一种非常牢固的血缘关系。

李自芬 这种现象太多了。除了诗歌创作，小说、散文创作等方面也是如此。如周作人、林语堂对中国传统的日常器物、生活情调的精雕细琢的品味，废名、沈从文等人有意识地对乡土中国、乡土人生的追忆和寻找，以及老舍对老北京乃至老中国的儿女情长、人情世故的孜孜眷恋，其主动回向传统的情绪、情感是非常强烈的。

毛迅 鲁迅也是一个典型。他作品中对故乡、对三味书屋的复杂的留恋之情，表明其骨子里充满了对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东西的那种难以割舍的复杂情结。

李自芬 从上述分析可以见出，无论是极端的反传统，还是主动沟通中西，抑或是有意识地回向传统，在所有这些形式中都难以见到中国文化传统模式的单一呈现，相反，整个现代文学在外在形态上已经生长为一个复杂的新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的确是一个融会了许多“新”“旧”因素的“新文学”。而且，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回归也只能表现为一种内在指向——传统的内在思维和精神模式，它已经不可能回到原来的古典形态。所以，我们看到的新文学中的传统因素往往是无意识的自然流露，而正是这种无意识表现出了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及内在动力。

李怡 与传统相比，这种发生了改变的事实，我们并不否认其外在形态上有很多对西方文学技巧、西方诗学话语的使用。但是，就像我们上面一再强调的，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在这些技巧和言说符号的背后，那个根深蒂固的流淌于字里行间的中国式的精神传统及思维模式。

李自芬 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就是新文学这一复杂形态的表征。从精神上、气质上她都对西方文化有非常倾心的投入，她最早的写作就是用英文来书写的。其小说的技巧也是非常西方化的，一般认为她是真正西方心理分析小说技巧运用得最纯熟的现代作家。但是，在她的创作中，传统就像一只精灵似的黑猫，不经意间就从字里行间跳将出来。如她对《传奇》封面的设计与说明，那个在传统的窗外突然伸进头来的一个极现代的女子，使整个画面变得突兀和怪异。但是，其中的中国式的精神体验则是轻易就能感受到的。她并不刻意，但其西化、摩登的外表下，老中国的人情世故尽览无遗。除了这种中国传统的韵味外，其结构及语言风格也是比较传统的，受《红楼梦》等传统小说结构的影响比较明显。

李怡 整个《红楼梦》的“家”的书写模式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影响深

远，巴金是典型。“家”这个母题，在小说中，可能是叙事模式。“家”所代表的那种对传统的既恨又念的心理情结，到八九十年代，还在张炜、苏童等作家的创作中一再复现。可以这么说，小说中“家”这样的传统母题，在诗歌中可能是以意象、气氛、意境的方式来体现的。

毛迅 创作中的这种对传统的细雨润无声似的依恋，从新文学诞生始就从未中断。一直到40年代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理论主张，可以有力证明，新文学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传统。上面我们都是就新文学的主流来分析的，实际上，在我们主流文学史忽视的广大的通俗文学创作领域，其与传统的血脉关系就更明显，如当时以传统的章回小说形式书写的通俗艳情小说、武侠小说。

李怡 那么，这也说明，我们文化的内在精神结构在起作用。除此之外，许多新文学作家，公开表示就是要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比较极端的表现是通俗小说和旧体诗，如许多新文学作家公开发表了许多新文学著作，但他同时又不断地写旧体诗。在诗人唱和之间，表达、排遣个人心绪时他自然就选择了旧体诗，如鲁迅、毛泽东等。当他要表达自己最内在的情感时，他就用旧体诗，似乎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表达尽他的内在情感。再就是刚才所说的中西交融，对传统的自觉和西方的自觉是并行的，如新月、现代派，他们试图把传统和西方沟通起来，通过沟通更好地将两者的精华吸收。

李自芬 闻一多向往和追求的“中西结合的灵馨儿”，即是代表。其“三美”理论整体上充满了中国传统律诗的精髓。所以说，其现代格律诗就是从传统格律诗得到的启发。只是用白话再来重新演绎传统诗歌中的这些美的特质。

李怡 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就反传统的创作而言，并没有变成一个与中国无关的东西，其书写的仍然是中国人的情绪和情感，包括艾青、穆旦在内。

毛迅 所以，从上述列举的三大类都证明，传统文化的血脉始终存在，既有显的层面也有隐的层面，但一直在流动，从未断裂。这种承传的关系是绝对的。

李怡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对所谓反传统——这个偏激口号的存在现象加以研讨。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新文学的始作俑者的确有许多偏激的口号或者说偏激的言论，但从刚才的分析，首先可以得出，无论怎样的偏激，他们都没有从总体上——生命意义上改变他们与传统的联系。可以这样说，传统的运行是以多种方式存在进行的，就像河流有支流、要改道一样。但有一种运行方式我们必须承认：传统的延续是通过对他自身的一种反叛性的调整来构成的。打个比方，一个胎儿如果要获得自己独立的生命，就必须要先与母体断裂，如果断裂指的是这样的方式，则这个断裂就是合理的。胎儿如果不从母体断裂出来，他就无法成长为一个生命。但是，他并没有达到那些指责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上的断裂，那种断裂意味着与传统毫无关系，成了一个异类。一个婴儿从母体诞生后，他并不是生命的异类，他恰恰是充分地吸收了来自母体的营养，甚至接受了他的生命基因、血缘等才成长为一个健康的生命。这种断裂是形态的、生存方式的改变，内在的血脉则延续下来了。

毛迅 如果以婴儿降生为例，那么，降生这种形式所体现的反叛、断裂，恰恰是他继承传统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理性地看待一些反传统的行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构成了传统自我有效延续的调节办法。因为脐带的割断，是切不断血脉、基因之间的联系。另外，有时候，偏激的言行——全盘西化的诉求可能是一种策略，在特别的情况下要发出一种声音让所有的人来关注，或者说让很多人能够听到，他也许要用一种过激的方式使其声音放大。或者，这种偏激有可能是某种政治上的需要，他是对传统的负面的东西——对国家的未来、命运的发展有阻碍的东西，这是从救亡的角度——政治的角度来说的。其反传统实际上是反传统文化中阻碍中国向现代社会形态发展的因素，笼统来说，是希望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向先进的发达的国家学习这一面。因而，它更多的是一种策略，并不意味着是对传统文化的所有形态、所有内容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盘否定。

李自芬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种偏激实际上也是一种对话语权的争夺和掌控现象？这也反映出，在文化转型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原有的话语权力面临重新分配，为了在新的权力格局中占有主导或者说一席之地，弱小者必须尽力地喊出并放大自己的声音，以引起注意，就像刚出生的婴儿都要大声啼哭一样。而且，原本被挤压、压抑太久的声音，一旦获得释放，其能量也是极为惊人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偏激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话语策略。甚至，有时这种偏激往往演化为一种单纯的才性或者说是义气之争，如创造社以及后来的太阳社等常表现出来的非常过激的言行。

李怡 这也是一种生存的需要。因此，任何一种理论的表述，任何一种语言、概念，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之下，才能准确地判断其真实的意图，离开了语境，单纯的一个词如高、矮，都是一个不确定的漂浮的词语，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高、矮，只有放在特定的语境下，我们才能准确地说出这个词的含义。那么，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为例，整个传统文化对新生事物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对新的生命的生长构成了一个几乎窒息的程度，这个时候，新的生命为了获取生长的可能性，的确会采取一种在我们今天看来比较偏激的方式来击破这样一种自我束缚的外壳，只有冲破这个外壳，才能找到一个新的生长点。这个偏激本身具有合理性。我们要理解这个偏激，就必须了解当时的整个文化语境的影响。没有如此强大的来自传统文化对他近于窒息的挤压，也许连那个偏激本身我们也不能够发现。

毛迅 要一潭死水起点波澜，必须要投石。要它自身产生运动变化是不可能的，只有以破坏的方式来激活他。其实这种破坏方式的重要指向还是封建主义。它不是附着在或者说依托在中国封建主义思潮的所有的文化因素上，口号上是偏激的，但本质上是针对封建主义的。

李自芬 的确，自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说》里大力标举“破坏”始，这种对传统几近偏激的抨击之声就不绝于耳。比如，《新青年》要“打倒孔家店”，胡适们要清除掉传统的“死文字与死文学”，鲁迅要年轻人不读“中国书”，而毛泽东等社会主义者更是要砸烂“旧中国”、“革”掉它的命，其偏激武